

走读湖湘书院



山高人为峰

——丽泽千年的城南书院



湖南省第一师范学院城南书院校区(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旧址)。

乔育平 摄

颜兼薇

衡山西,岳麓东,城南讲学峙其中。人可铸,金可熔,丽泽绍高风。多材自昔夸熊封。学子努力,蔚为万夫雄。

这是一首校歌,从历经千年的城南书院唱起。这是一首校歌,唱出了湖南第一师范的豪迈。

很多人知道,誉称“百年师范”的湖南第一师范是一代伟人毛泽东的母校,一所涌现了蔡和森、何叔衡、任弼时、李维汉、杨昌济、徐特立、孔昭毅、易培基等一批革命家、教育家的名校,一个闻名中外的红色圣地和网红旅游打卡地。

可很多人并不知道,誉称“千年学府”的湖南第一师范,始于南宋宰相张浚和理学大师张栻创办的城南书院,一所在清代前期就成为全国二十三所、湖南两所省会书院之一的书院,一所成为近代湖南五大人才群体摇篮的书院。

1. “必有其原因”

其实,我以前也不是很清楚。二十多年前,我在长沙市天心区委办公室工作。那时的区委区政府大楼就在南门口不远处,距湖南第一师范城南书院校区只有一公里路程。我多次因公经过学校门口,但始终不曾进去过。也许是因为跟许多人一样,当年对学校的辉煌历史和厚重底蕴了解得不够多,不够深,心底的崇敬感和渴望感也就不够大、不够强。

后来,我来到湖南第一师范工作,才开始深入了解并很快爱上这所源远流长的名校。

也许是缘分,从毛主席倡办的湘潭大学毕业多年后,我来到毛主席母校工作,并开始了毛泽东研究和湖南第一师范校史(含城南书院史)研究。通过研究发现:伟人既不是天生的,也不是偶然的。湖南第一师范学子毛泽东能成为世界伟人,就像其母校成为中华名校一样,不是无缘无故的。正如教育部原部长何东昌题词所言:“伟人长于此,必有其原因。”

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。譬如,湖南第一师范深厚的湖湘文化底蕴和开明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意识;名师熏陶和益友砥砺为“集合同志”打下坚实基础;科学的招生办学体制和积极的自身努力保障了选才与成才。显然,关键原因之一就是湖南第一师范传承了城南书院“成就人才,传道济民”的优良传统,弘扬了城南书院与岳麓书院等共同孕育的湖湘文化,并以此培育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学子。

在湖南乃至中国书院史、教育史上,在近代湖南崛起史乃至近代中国变迁史上,城南书院都是绕不开的传奇。



游客参观毛泽东与第一师范纪念馆。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辜鹏博 通讯员 罗汇芳 摄

2. 学府近千年



明代长沙妙高峰地舆图。

妙高峰虽说不高,海拔仅仅70米,但能名扬千秋,自有其妙处。据明崇祯时的《长沙府志》记载:“妙高峰高耸云表,江流环带,诸山屏列,此城南第一奇观。”

为体验高峰之妙,清代两江总督陶澍曾亲临此地,并留下了脍炙人口的《长沙竹枝词》:“妙高山色画屏新,妙高山下水融融。多少游人不知味,出山何似在山真。”

如此妙处,作为书院办学之所自是上佳之选。南宋绍兴三十一年(1161),一代名相张浚(1097-1164)以观文殿大学士知潭州(今长沙),携子张栻(1133-1180)在妙高峰筑造了书院,并亲书院额“城南书院”。共有屋宇31所,基地园土26处,并辟有讲院、讲堂和六斋(居业斋、进德斋、主敬斋、存诚斋、正谊斋、明道斋)。营造了“城南十景”:丽泽堂、书楼、养蒙轩、月榭、卷云亭、集楼、台榭之胜,南阜、琼净谷、纳湖、听雨舫、采菱舟融自然山水之秀。还有东渚、咏归桥、船斋、兰涧、山斋、石濂、柳堤、濯清亭、西屿、梅堤等十大胜迹,美不胜收,让人目不暇接。

乾道三年(1167),时任城南书院院长兼岳麓书院院主的张栻,与从福建慕名而来的朱熹(1130-1200),在两大书院轮流讲学论道将近两月,成就了千古佳话“朱张会讲”。讲学之余,他们流连于城南书院各大美景之中,并留下了《城南杂咏二十首》和《奉同张敬夫城南二十咏》。

可惜天妒英才,张栻48岁就英年早逝,归宿宁乡官山。在弟子胡大时以及再传弟子们的传承下,城南书院依旧弦歌不辍。

当大宋摇摇欲坠走到德祐元年(1275)的时候,忽必烈的灭宋战打到了潭州城。城南书院堂堂斋舍惨遭元兵焚毁,“十景”也几成荒芜。后来有人将南阜上的“苍然观”改为“高峰寺”,幸好张浚手书“城南书院”院额仍存寺内。

直到明正德二年(1507),湖广行省参议吴世忠和湖南提学道陈凤梧提议恢复城南书院,但旧地已为吉王府所据。嘉靖四十二年(1563),长沙府推官翟台在高峰寺下建得学堂五间,但万历六年(1578)复废。

“道脉南楚,朱张仰昔贤。”许多文人雅士甚为怀念,纷纷寻旧访古。康熙年间,岳麓书院院长李文瓘寻访后写下《怀张浚故宅》:“元臣矢庙算,力战绝和书。蜀道安磐石,平江返日车。亭台芳草合,池沼白蘋疏。弦诵留遗泽,承家仰硕儒。”

雍正十一年(1733),朝廷谕令各省兴建省会书院。全国共建23所,其中湖南、江苏、广东、广西各建两所,其他省各建一所。尽管元明时期荒废许久,但城南书院还是与岳麓书院同为省会书院,并共享一千两帑金的膏火。显然,城南书院在康熙年间(1714)生员易象乾等集资修复后,雍正时仍有讲学活动和极高声誉。

但城南书院正式官方化并变得规制完备,是在乾隆年间。乾隆十年(1745),新任巡抚杨锡绂赴岳麓书院课试生童,但见肄业生寥寥无几,大失所望。得知士子畏涉湘江之因后,决定在城内都司旧署重建城南书院,以解决学子求学和官吏课试之不便。重

3. “君子六千人”

“物态凝眸而盎盎,千古灵区;弦歌人听以雍雍,一方雅化。”

城南书院的“雅化”从南宋开始,以理学“主打”。城南书院采用个别钻研、相互问答、集众讲解相结合的教学方法,以研习儒家经典为主,间或议论时政,成为“昔贤过化之地”“湘中子弟争来讲学之区”,对湖南乃至全国都产生了重要影响。

这个时期的最大功臣,无疑是世称南轩先生的创始人张栻。他早年从“开创湖湘之学统”的大儒胡宏问程氏之学。胡宏赞之:“圣门有人,吾道幸矣。”后来掌教城南书院,又兼主岳麓书院,还在碧泉书院聚徒讲学,声名盛极一时,与朱熹、吕祖谦合称“东南三贤”。

张栻既是理学家,也是教育家。在办学方针上,主张以“成就人才,传道济民”为宗旨。在招生上,主张为国选士的精英教育。在教学程序上,主张由浅入深、由低到高。在教学内容上,强调以儒家经典为基本教材。在教学方法上,提倡循序渐进、学思并进和培养独立思考能力。在教学环境上,以讲堂讲授为辅,以师生相从燕游讲习为主。在知行关系上,主张“知行并发”,认为“行之力则知愈进,知之深则行愈达”,反映在教学上即主张学为实用。在张栻掌教下,城南书院涌现了一批传承道统、匡济天下的英才。

据考证,城南书院院长张栻门下有17位:胡大时、胡大壮、吴猎、赵方、游九言、游九功、陈琦、方来、潘友端、宇文绍节、范仲瀚、范仲芭、钟昭之、张翼、曾搏、吕胜己、周奕。他们多为理学门派优秀子弟,半数以上中进士、有官职。张栻并不反对学生应举,因为有官职者能更好地“传道济民”,他只是反对“为举业而来,先怀利心”的唯功利论。

南宋之后,城南书院在元明两代走过一段曲折历程。清中叶异地办学时(天心阁时期),谭又新、吴铁夫、吴德汉、余廷灿、杨宗岱、陈士雅、朱声亨、罗畴、罗廷彦等山长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,但主体课程仍是程朱理学和四书五经,侧重于《四书集注》等宋儒著作诵读。城南书院再次真正兴盛,是道光二年(1822)在妙高峰旧地复建以后。

鸦片战争后,一些开明山长倡行经世致用之学,城南书院学风由此大为改观。贺熙龄山长要求学生“以立志穷经为有体有用之学”,除了义理、考据、词章学之外,兼学经济之学,由此培养了左宗棠、胡林翼等一批经邦济世之才。左宗棠在城南书院收获甚大,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其人生走向。郭嵩焘山长也进行了改革,教学内容重“实学”“时务”,授课方式以学生自研为主,教师讲读为辅,并设立会讲制度辩论争议性问题,由此培养了张百熙、瞿鸿禨等优秀门生。黄兴入读城南书院长达五年,先后从山长王先谦、刘凤苞,学识大进。

甲午战争后,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和西学东渐的深入,书院教育面临巨大挑战。光绪二十四年(1898)初,城南书院学子宋璞等向巡抚陈宝箴提交了《请酌改城南书院课程禀》,希望将本院每月官课仿照经济特科增加内政、外交、理财、经武、格致、考工六门命课,山长课仍课四书文兼课时事。陈宝箴准其所请。随后,城南书院进行了课程大改革,第一,引入和增加新学课程;第二,增加算学和译学课程;第三,按新增新学分门课试。

在贺熙龄、陈本钦、何绍基、郭嵩焘、王先谦、刘凤苞等山长掌教下,城南书院和着时代的节拍与近代湖南前进的步伐,形成了与近代湖南相一致的五大人才群体,即以李星沅、唐鉴、贺熙龄等为代表的经学主变派,以曾国藩、左宗棠、胡林翼、郭嵩焘等为代表的理学经世派;以樊锥、皮锡瑞等为代表的维新变法派;以谭延闿、黎澍等为代表的君主立宪派;以黄兴、陈天华、杨毓麟等为代表的辛亥革命派,推进了近代湖南乃至近代中国的发展。

“燕柳最相思,身别修门二十载;楚材必有用,教成君子六千人。”这是黄兴的老师、曾任湖北布政使的梁鼎芬撰写的武昌府头门联。也有人说,这可能是称赞城南书院的名联,因为下联用来形容城南书院实在是太贴切不过了。是的,确实贴切。

于是,我亦撰联一副:城南宛然浮玉,千载讲学胜地,古非师范今师范;书院长与流芳,百年革命摇篮,我不第一谁第一?